

清华简《系年》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

晁福林

关于两周之际的史事，史载缺略，正如清儒崔述所言，“西周之亡，载籍缺略，其流传失实，以致沿讹踵谬者，盖亦有之”。^①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曾谓“秦既得意，烧天下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诸侯史记尤甚，为其有所刺讥也。《诗》、《书》所以复见者，多藏人家，而史记独藏周室，以故灭。惜哉！惜哉！”^②《史记》所涉两周之际史事仅限幽王嬖爱褒姒、烽火戏诸侯、立平王“以奉周祀”数者，^③缺略太多，语焉不详。李学勤主编的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（贰）出版后，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。清华简此册集中记载从西周初年直到战国末年的纪年资料，李学勤等专家筚路蓝缕，对于这批资料进行释读和整理工作，大大便利了后来学者的研究。根据简文内容，整理者将这批材料拟题为《系年》。其第二章内容提供了与古本《竹书纪年》相类似的关于两周之际史事的珍贵资料。今就相关材料依次探讨，冀求对于两周之际史事研究有所裨益。

一、“周二王并立”

古本《竹书纪年》保存两周之际“二王并立”史事，内容如下：

平王奔西申，而立伯盘以为太子，与幽王俱死于戏。先是，申侯、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，以本太子，故称天王。幽王既死，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。周二王并立。二十一年，携王为晋文公（侯）所杀。以本非嫡，故称携王。^④

古本《竹书纪年》记载和《史记》所载的最大区别，就是它揭示了“周二王并立”的史事，而对于这一点，《史记》所载则付诸阙如。司马迁有无可能见到“二王并立”的史载呢？分析相关情况可以断定，这种可能性不大。在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中，司马迁有“周太史伯阳读‘史记’曰”之语。关于“太史伯阳”，当即《国语·周语》提到的“伯阳父”，韦昭注谓其为“周大夫”，盖以大夫之身份而为王朝史官者。伯阳父所读的“史记”，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谓“诸国皆有史以记事，故曰‘史记’”。关于这部“史记”，专家指出它就是“西周时代的史官们所记载下来的历史资料”，^⑤这些历史资料，司马迁是有可能见过的。但是，尚有两个问题，一是自

① 崔述撰著，顾颉刚编订：《崔东壁遗书·丰镐考信录》卷7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245页。

② 《史记》卷15《六国年表》序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686页。

③ 《史记》卷4《周本纪》，第149页。

④ 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六年“正义”引《汲冢书纪年》，《十三经注疏·春秋左传正义》，台北：艺文印书馆，2007年，第903页。

⑤ 金德建：《司马迁所见书考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63年，第425页。

厉王之后史记疏略不全，即《史记·历书》所言“幽、厉之后，周室微，陪臣执政，史不记时，君不告朔”；二是《史记·六国年表序》所言“独藏周室”的“史记”灭于秦火。由于这两个原因，可以推测司马迁不一定见过伯阳父所读之“史记”。他能够取《国语·周语》、《晋语》、《郑语》的相关传说敷衍连缀而成幽王史事，已属不易。因为没有见到相关史料，所以在《史记》一书中司马迁丝毫未提“二王并立”之事，也就不足为怪。

古本《竹书纪年》的相关材料对于弥补两周之际的史载非常宝贵，顾炎武、梁玉绳等曾经注意到这些材料。当代专家亦曾依据古本《竹书纪年》、《国语》等材料对于两周之际史事进行梳理，例如，徐中舒先生在《先秦史论稿》中提到两周之际“二王并立”，^① 童书业先生于其所著《春秋左传研究》中单列“周二王并立”一条进行阐述。^② 笔者曾撰《论平王东迁》一文。^③ 我所探讨的结果，可以用下表显示大概。

周“二王并立”情况表

并立之王	并立之王	并立时间	并立时间（公元）	并立年数
幽王	丰王（伯服）	周幽王五年至八年	前 777—前 774	4 年
幽王、丰王（伯服）	天王（太子宜臼）	周幽王八年至十一年	前 774—前 771	4 年
天王（太子宜臼）	携王（王子余臣）	周幽王十一年至晋文侯二十一年	前 771—前 760	11 年

笔者所理解的“周二王并立”与古本《竹书纪年》所说稍有区别。古本《竹书纪年》所谓的“周二王并立”仅指天王（太子宜臼）与携王（王子余臣）的二王并立。其实在此之前幽王嬖爱伯服（盘），立其为王，实为幽王破坏王朝规矩、违背传统的昏庸之举。太子宜臼被拥立而称“天王”以后，^④ 就形成幽王、丰王（伯服）与天王（太子宜臼）的两派对峙，再接下来才是天王与携王的对峙。关于伯服称王事，参加过汲冢竹书整理的晋代学问家束皙的一个说法，^⑤ 是很有力的证据。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六年“正义”引束皙说谓：“案《左传》‘携王奸命’，旧说携王为伯服，古文作伯盘，非携王。伯服立为王，积年，诸侯始废之而立平王。”他认为伯服（盘）虽然不是携王，但却是自己称过王的，并且非止一年，而是有好几年的时间，孔颖达同意此说，谓“其事或当然”。^⑥ 所谓“积年”，指伯服为王数年，绝非一年当之。伯服称王肯定是在

① 徐中舒：《先秦史论稿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1992年，第304页。

② 童书业：《春秋左传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40页。

③ 晁福林：《论平王东迁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91年第6期。为简省计，相关详细考证已见于此文者，本文不再重复。

④ 关于太子宜臼的“天王”之称，古本《竹书纪年》谓“以本太子，故称天王”，揆其意是指太子为王，实际上表明与伯服所称之王相对立，表示太子宜臼为王乃是正宗。春秋时期记周天子事，每谓“天王”，其意是“海内之王主，至尊之极”（孔颖达《左传正义》隐公三年语），是言其尊贵。太子宜臼所称之“天王”当与后世行用者意义稍有别。“天王”之称于商和西周时未见，只是常用于春秋时期，至战国以降，亦少见。宜臼之称“天王”可谓开此称行用之端绪。

⑤ 晋武帝曾命令将汲冢竹书“付秘书校讎次第，寻考指归，而以今文写之。皙在著作，得观竹书，随疑分释，皆有义证”（《晋书》卷51《束皙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1433页）。可见，束皙对于《竹书纪年》的整理下过很大功夫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“伯服为太子”，索隐谓“《左传》所谓‘携王奸命’是也”，虽然以伯服为携王并不准确，但是，亦可见司马贞认为伯服曾为王。

⑥ 《左传正义》卷52，台北：艺文印书馆，2007年，第904页。按，孔颖达于《春秋左传正义》中不仅引用古本《竹书纪年》关于“周二王并立”的大段资料，而且称引整理过古本《竹书纪年》竹简的束皙之语作进一步论析。亲见古本《竹书纪年》的孔颖达此语对于说明伯服曾称王之事有比较重要的价值。

宜臼称王之前。依笔者拙见,伯服称王当首尾七年,直到骊山之难被杀为止。束皙说伯服称王过了若干年才被“诸侯废之而立平王”。这与古本《竹书纪年》等史载谓伯服与幽王俱死于骊山之难的说法不一致,其间是非,尚难确定。不过,据清华简《系年》所载,可以大体上认为古本《竹书纪年》的记载较为可信。清华简《系年》所载相关资料,可以印证上表所列是正确的,并且可以对两周之际史事作出一些新认识。为便于讨论,现将清华简《系年》第2章的相关内容具引如下:

周幽王取(娶)妻于西繻(申),生坪(平)王,或取(娶)孚(褒)人之女,是孚(褒)念(姒),辟(嬖)于王,王(以上第5简)与白(伯)盤逖(逐)坪(平)王,坪(平)王走西繻(申),幽王起自(师)回(围)坪(平)王于西繻(申),繻(申)弗散(界),曾(鄭)人乃降西戎,以(以上第6简)攻幽王,幽王及白(伯)盤乃灭,周乃亡。邦君者(诸)正乃立幽王之弟舍(余)臣于鄩(虢),是嚙(携)惠王。(以上第7简)立二十又一年,晋文侯戡(仇)乃杀惠王于鄩(虢)。周亡王九年,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。(以上第8简)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,立之于京自(师)。三年乃东遯(徙),止于成周。晋人焉始启(以上第9简)京自(师),莫(鄭)武公亦政东方之者(诸)侯。(以上第10简)①

这些内容有的可与其他记载相互印证,有的内容还可补史载之阙。这主要有以下四点。

其一,清华简《系年》简文所载“周幽王取(娶)妻于西繻(申)”事,《史记·周本纪》没有记载,只谓幽王“废申后”,根据这一点,史家只能推测幽王必娶于申。“申”国于周代多见,申后之“申”是哪一个“申”国,过去史载不明。从古本《竹书纪年》所载“平王奔西申”之说,可以推测申后之“申”当即西申。清华简《系年》的这个明确记载对于落实申后之申(亦即后来参与攻灭周幽王的申侯之国),是为有力证据。

其二,周平王为太子时被何人所逐出,《周本纪》未载,②古本《竹书纪年》语焉不明,《国语·晋语一》说是幽王与褒姒、虢石甫逐太子宜臼。《系年》此简明谓“王与白(伯)盤逖(逐)坪(平)王,坪(平)王走西繻(申)”。据此点亦可推测伯盘(亦即史载之“伯服”)当为成年人,其年龄当较宜臼为长,故而称其为“伯”。

其三,《国语·郑语》载史伯语谓:“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,必求之申,申人弗界,必伐之。若伐申,而缙与西戎会以伐周,周不守矣!”这里所说周幽王必伐申国,是史伯的推测之语,《史记·周本纪》未言此事,亦无其他史载可以印证。清华简《系年》则明谓“幽王起自(师)回(围)坪(平)王于西繻(申),繻(申)弗散(界)”,这是首次发现的可以印证《郑语》所载史伯之语的资料。

其四,关于伯服(盘)的下落,《史记·周本纪》只言西夷犬戎“杀幽王骊山下,虜褒姒,尽取周赂而去”,不说伯服是否遇骊山之难。古本《竹书纪年》说伯服“与幽王俱死于戏”。《系年》简则谓“幽王及白(伯)盤乃灭”,其意与古本《竹书纪年》所载相同,可证伯服(盘)确实在骊山之难时被杀。

① 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(貳),上海:中西书局,2011年,第138—140页。

② 关于幽王与褒姒、申后之事,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颇简略,只谓幽王“三年,幽王嬖爱褒姒。褒姒生子伯服,幽王欲废太子。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。后幽王得褒姒,爱之,欲废申后,并去太子宜臼,以褒姒为后,以伯服为太子”。此记载两谓幽王嬖爱褒姒,叙事比较模糊。分析相关记载,可靠的推测应当是幽王继位前即已娶褒姒、生伯服(即古本《竹书纪年》和清华简《系年》所说的伯盘),伯盘年长于太子宜臼(参见晁福林:《论平王东迁》,《历史研究》1991年第6期)。《周本纪》的记载并未明言何人何时逐太子宜臼之事。

除以上四点以外，我们还应当讨论一下清华简《系年》简文所谓“周亡王九年，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”的问题。简文意思是说，周王朝有九年无王，邦君诸侯在这个时间里才开始不朝觐于周。这句简文表明，清华简《系年》的作者不承认“周二王并立”这一史实。这是它与古本《竹书纪年》明谓“周二王并立”的最大区别。分析二王并立的情况，我们可以说，两周之际虽然政局混乱动荡，但不存在无王之状态。清华简《系年》的作者认为有“亡（无）王”的九年时间，是他不承认“二王并立”的结果。清华简《系年》谓“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，立之于京自（师）”，依照《系年》作者的看法，周的王统当由被晋文侯拥立于京师的平王来接续。此前的平王被拥立为“天王”，和“携王”一样，也是不算数的。从幽王之死到携王被杀首尾十一年，掐头去尾，正是“九年”之数。简文的“始不朝于周”，当是统称此无王的“九年”，不是指无王的第九年。清华简《系年》简和古本《竹书纪年》简的作者的王朝正统观念不一致，这是相关研究应当予以注意的一点。古本《竹书纪年》和清华简《系年》的作者都有比较浓厚的周代礼制观念。王位由嫡长子承继，是为周代宗法之核心内容之一。^① 古本《竹书纪年》强调携王“非嫡”，清华简《系年》则指明携王是“幽王之弟舍（余）臣”，已含有“非嫡”之意。两者述史的指导思想都有较强的宗法礼制观念，但于王朝正统的理解还不大一致。

除了以上与其他史载相互印证或补其缺者以外，清华简《系年》所载还有若干内容与其他记载相异之处，对于认识两周之际的史事亦有重要作用。这些主要表现在关于携王之立与平王东迁的问题上。

二、携王之立与被杀

清华简《系年》简文谓“周乃亡。邦君者（诸）正乃立幽王之弟舍（余）臣于鄲（號），是瞞（携）惠王”，古本《竹书纪年》则谓“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”。两者记载虽然大体一致，但是拥立者和拥立的地点则不相同。拥立者，一谓虢公翰，一谓“邦君诸正”。拥立地点，一谓是號，一谓是携。我们重点讨论拥立者的问题。清华简《系年》和古本《竹书纪年》关于携王的拥立者虽然表述不一，但尚可融通。因为虢公也当属于“邦君者（诸）正”之列。

虢公在很长时段里世代为周王朝卿士，文王时有虢仲、虢叔，厉王时有虢公长父、宣王时有虢文公、幽王时有虢公石父，桓王时有虢公忌父、虢公林父等，都是权重一时之卿。虢公翰主政的时间在幽王末年和两周之际，《世本》（秦嘉谟辑补本）将其列在幽王十一年，^② 近是。

关于拥立携王的虢公翰，雷学淇说是东虢君，谓：“知之者，此时西虢之君名鼓字石甫，王之九年史伯语郑桓公尚云虢公从矣，则此时石父尚存可知，或死于丽山或逃于下阳，皆无书可质。知此虢公翰非石父之嗣者，平王之志止在得位，申侯弑其父而立之，不以为仇，而且德之，虢立王子余臣于携，即锡命晋、郑使灭东虢而杀余臣，若石父父子前辅伯服，后辅余臣，王能与之甘心

① 嫡庶争立之事于周代多有，但庶子争立是不符合宗法原则的。按照宗法观念，嫡长子承继王位或宗子之位，可使名分早定而免去争竞。正如《吕氏春秋·慎势》篇所说，“慎子曰：‘今一兔走，百人逐之。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，由未定。由未定，尧且屈力，而况众人乎？积兔满市，行者不顾。非不欲兔也，分已定矣。分已定，人虽鄙不争。’故治天下及国，在乎定分而已矣。”《公羊传》曾经总结承继统绪之事，谓“立适（嫡）以长不以贤，立子以贵不以长”，何休《解诂》云：“嫡，谓嫡夫人之子，尊无与敌，故以齿。子，谓左右媵及侄娣之子，位有贵贱，又防其同时而生，故以贵也。”（李学勤主编：《十三经注疏·春秋公羊传注疏》卷1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3页）

② 宋衷注，秦嘉谟等辑：《世本》卷5《世本八种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57年，第67页。

而绝无一矢之加，使又享国百余年而且界之政乎？以此推验，知此虢公即虢叔也。”^①这个推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：一是虢石父或死或逃，下落不明，其子不太可能继之为王朝之卿；二是周平王与虢公有杀父之仇，且虢公又拥立携王，所以不可能任用虢石父之子为卿。这两条理由都是可以成立的。拥立携王的虢公翰的确不应当是虢石父或其后嗣。

然而，雷学淇谓虢石甫是西虢君并且虢公翰为其子嗣，这是值得商榷的。实际上，虢石甫（即虢石父）应当是东虢君，而虢公翰并非其子嗣。《国语·郑语》谓幽王时“虢叔恃势”（韦昭注谓“此虢叔，虢仲之后”），其时虢叔在王朝中因为与褒姒关系密切而权倾一时。此虢叔是东虢君，而非西虢君。他在骊山之乱时或死或逃，自顾不暇，何曾有权势拥立周王？据《史记·郑世家》和《国语·郑语》的说法，东虢在幽王八年至十一年间即被郑灭掉。骊山之乱后，东虢消沉是显见的事实。由此看来，拥立携王者应当是西虢君。西虢之地在丰镐以西的宝鸡、岐山、凤翔、扶风一带。可以推测，骊山之难时，王子余臣西逃，而被西虢君虢公翰拥立于虢地。虢公翰当即西虢之君而入主朝政者。其时在骊山之难以后。这种情况与周王朝厉、宣之际卫武公共伯和入主朝政相类似。

周代虢国源于文王之弟虢仲、虢叔。《左传》僖公五年载：“虢仲、虢叔，王季之穆也，为文王卿士，勋在王室，藏于盟府。”贾逵云：“虢仲，封东虢，制是也。虢叔封西虢，虢公是也。”古本《竹书纪年》明谓虢公翰拥立携王，清华简《系年》则谓携王立于虢，则此虢当即西虢。清华简《系年》整理者认为“简文‘虢’当即其时可能已迁至今河南三门峡的西虢”。^②此说认为该“虢”为“西虢”是正确的，谓其地在今三门峡地区，也只说有这种可能，可见其矜持谨慎态度。笔者认为此拥立携王的虢，不大可能是三门峡地区者。因为这个地区的“虢”，平王东迁以后才从西虢迁来。^③文王时虢叔的东虢，在幽王末年被东迁的郑灭掉，此即《左传》隐公元年所说的“制，严邑也，虢叔死焉”。拥立携王时三门峡地区是为郑所辖，平王东迁时西虢君才随周平王东迁，占有原东虢故地，并为东周初年的平王、桓王所重视，曾经一度想分权力于虢公，终遭郑的强烈反对而暂时作罢。^④郑所以强烈反对周王分政于虢，与西虢随平王东迁而占有原被郑据的东虢故地，应当有一定关系。

《系年》简称立携王者为“邦君诸正”，说法笼统。“邦君”之称见于《尚书·大诰》“告我友邦君”，《尚书·牧誓》称“友邦冢君”。“友邦”当指与周友好之邦。^⑤《系年》简称“邦君”而不称“诸侯”，盖也有这种用意，指非周王朝分封的国家。简文所提到的“邦君”，是指哪些邦国，已不可确知。“诸正”当指任职于周王朝的职官，与古本《竹书纪年》所载拥立携王的虢公翰的身份相符合。虢公翰作为虢国之君而入主朝政，与“邦君诸正”是可以相合的。就此而言，清华简这一记载与古本《竹书纪年》并不矛盾。

① 雷学淇：《竹书纪年义证》卷27，台北：艺文印书馆，1977年，第422页。

② 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（貳），第139页。

③ 关于虢的东迁，彭裕商认为，20世纪90年代发现的三门峡虢国墓地的高规格大墓当属春秋早期。他综合研究各种材料以后指出：“从西周晚期关中政治形势看，并不存在虢国必须东迁的紧急情况，并且在王室尚未东迁的情况下，虢国也不可能独自先行东迁。因此，虢国的东迁当在平王东迁时。”（彭裕商：《虢国东迁考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06年第5期）

④ 关于平王、桓王欲分政的事，《左传》隐公有所记载，谓：“王贰于虢，郑伯怨王。王曰：‘无之。’故周郑交质。王子狐为质于郑，郑公子忽为质于周。王崩，周人将畀虢公政。四月，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。秋，又取成周之禾。周郑交恶。”直到隐公八年，虢公忌父才任卿士。

⑤ 或读“友邦”的“友”字为“有”，谓“友（有）邦”，疑非是。

西虢之地域，专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今陕西宝鸡、岐山、扶风、凤翔一带，最初是周文王之弟虢叔的封地。古本《竹书纪年》说虢公翰立携王，清华简《系年》谓携王被立于虢。笔者认为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，说虢公翰立携王于虢。这样比较圆通可信。虢公世代为卿，执掌王朝大权，有拥立携王的条件，并且他迎王子余臣到自己的虢国，拥而立之，亦是顺理成章之事。如此解释，我们便可以推测，在拥立周王的事情上，实分为王朝重臣与有影响的诸侯两派，以虢公翰为首的王朝重臣拥戴携王（王子余臣），而以申侯为首的诸侯则拥戴天王（太子宜臼）。后来晋文侯杀携王，并非偶然，它实际上标识着申、鲁、许等国诸侯一派的胜利，也反映了王朝势力的衰落。由于虢公翰拥立携王，所以平王时期主王朝之政者一直是郑伯而虢公不与焉。平王末年，因不堪郑伯专权霸道才欲分政于虢公，但也由于郑的强烈反对而未成。直到桓王时，虢公忌父才始任王朝卿士。^① 虢公在平王时期的王朝中权势的锐减，拥立携王应当就是其历史根源。携王被拥立和被杀，清华简《系年》谓皆在“虢”，似乎他一直在虢地没有离开。他被晋文侯所杀，清华简《系年》和古本《竹书纪年》的记载是一致的。^②

携王之立，可以说开周王朝庶孽之乱端绪。周代宗法制的核心原则是嫡长子继承制，其目的就是防止君位的争夺，此正如《吕氏春秋·慎势》篇所说：“先王之法，立天子不使诸侯疑（拟）焉，立诸侯不使大夫疑（拟）焉，立适子不使庶孽疑（拟）焉。”这个制度在西周时代基本上保证了王位的顺利交接，到了东周时期，则每有庶孽觊觎王位而作乱，如庄王时的子克之乱，惠王时的子颓之乱、襄王时的子带之乱、敬王时的子朝之乱等，这些祸乱成为东周王朝衰微直至覆灭的加速器，而携王之乱应当是其先河。

三、平王东迁

周平王东迁洛邑，是两周之际历史的转折点，它标志着西周王朝的覆灭和东周王朝的开始，这个事件对于整个先秦历史进程都有重大影响。关于两周之际的历史发展情况，过去我们从《史记》中得到的印象是，幽王因昏庸而在骊山之乱中被杀，之后被拥立的平王见镐京残破，便东迁洛邑，是为东周。关于平王东迁的具体经过，《史记》《国语》等皆语焉不明，古本《竹书纪年》虽然明确指出“周二王并立”，但并没有说明平王东迁的具体过程。清华简《系年》则首次揭示出这个过程的一些情况。如，简文谓：

周亡王九年，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。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，立之于京自（师）。三年乃东适（徙），止于成周。

这是以前史载中所没有的新材料。从简文可知，携王被杀时，平王居于“少鄂”。关于“少鄂”之地，《系年》简整理者谓“疑即《左传》隐公六年之晋地鄂，在今山西乡宁”。^③ 此地黄河以东吕梁山南端，周代是为晋地，平王居于此地，并非没有可能。然而尚有两点疑问，一是在两

① 参见《左传》隐公八年。

② 关于两周之际史事，今得清华简《系年》资料，比照古本《竹书纪年》记载，可知战国时人对于其间的史事变化有不同记载和说法。清华简《系年》和古本《竹书纪年》的相关记载，虽然可补史乘之阙而弥足珍贵，但皆各自为一家之说，许多问题尚不可视作最终定论，所以有不少问题仍待新材料的发现和更深入的研究。

③ 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》（贰），第139页。

周之际此地尚未称“鄂”。据《左传》，“惠之四十五年。曲沃庄伯伐翼。弑孝侯。翼人立其弟鄂侯”，此年是鲁惠公四十五年（前724），很可能鄂侯避难逃到乡宁此地，后来此地才称“鄂”。二是就当时“二王并立”的情况看，社会动荡，民不聊生，用周平王的话来说就是，“殄资泽于下民，侵戎我国家纯（殄绝其先祖之恩泽于下，犬戎侵犯我国家危害甚大）”。（《尚书·文侯之命》）不仅如此，而且“二王并立”时，今关中地区的政治形势极为复杂。就地域分布来说，大体上今关中地区西部渐为秦控制；中部以岐、丰为中心的地区先为携王、后为戎狄盘踞；其东部为平王管辖。一些异族小国则杂厕其间。^①“天王”与携王矛盾极为尖锐。周平王当不会退缩到黄河以东的偏远山区，而将关中地区拱手让与携王。笔者认为简文所说的“小鄂”，应当在镐京附近才符合“二王并立”斗争的形势。其具体地点尚不知晓，可存疑待考。

据古本《竹书纪年》，太子宜臼逃奔西申后，被申侯、鲁侯、许文公等拥立，称天王。此西申当即申侯之国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“正义”谓：“申侯之先，娶于骊山。”申侯之国当距骊山不远。太子宜臼所逃奔的西申，亦当在骊山附近。平王初在西申，后来又“杜”，可能有摆脱戎族影响的意图。后来他东迁洛邑，主要得力于晋、郑两国之助，而申、缙等国没有参与，亦可从侧面说明这一点。

两周之际，平王的行止路程可以略作推定，即他先从镐京逃奔西申（镐京东北骊山一带），被拥立，然后又居于镐京附近的“鄂”地，再被晋文侯从“鄂”地迎还镐京，并在镐京再次被拥立，为以晋、郑为首的众诸侯国所认可，重新接续王统。这段时间有九年之久，即清华简《系年》所说的“亡（无）王九年”。

还应特别提出的是，清华简《系年》确指平王东迁洛邑之年，即周平王于京师被拥立之后的第三年。他被拥立是在晋文侯二十一年（前760），^②若此年是第一年，那么前758年，就是简文所谓的“三年”。清华简《系年》所指明的平王东迁洛邑之年当是前758年。

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记周幽王十一年（前771）“幽王为犬戎所杀”，翌年，即前770年为平王元年，此年“东徙雒邑”。这表明司马迁撰《史记》时没有看到古本《竹书纪年》，也没有看到今天我们所知清华简《系年》中所保留的资料。他所可能见到的《春秋》《左传》则只载有隐公三年“三月庚戌天王崩”之事，未言周平王之年数。由于所见材料疏略，司马迁写平王

① 这些小国有在荡社（今陕西咸阳附近）的亳王之国，在彭衙（今陕西白水县东北）的彭戏氏，在秦以西的邽戎、冀戎等。

② 关于《系年》第8简所载“立二十又一年，晋文侯戡（仇）乃杀惠王于郾（號）”，李学勤说：这个“二十一年”，“应是携王的在位年，不是晋文侯的二十一年。在这一点上，今本《竹书纪年》等是正确的，王国维《古本竹书纪年辑校》却弄错了”。（李学勤：《清华简〈系年〉及有关古史问题》，《文物》2011年第3期）按，李学勤把这个“二十一年”定为携王在位年，是有道理的。但似乎还有另作考虑的余地。《系年》的作者不承认“周二王并立”，只承认被立于京师的周平王承继周的王统，简文“亡王九年”之意是为其证。再说，简文“立”字可以一字为句，亦可与上句“携惠王”连读，其下的“二十一年”可另起句，这种情况就与古本《竹书纪年》所载相一致。所以不排除此二十一年为晋文侯之年的可能性。再说，孔颖达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引《汲冢书纪年》的文字，由文意上看，“二十一年，携王为晋文公（侯）所杀，以本非嫡，故称携王”句紧连“周二王并立”句之后，有可能也是古本《竹书纪年》的话。梁玉绳即加以肯定（参见梁玉绳：《史记志疑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年，第103页），王国维据孔疏所引将此句判断为古本《竹书纪年》（王国维著，黄永年校：《古本竹书纪年辑校》，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17页）之语，是比较可信的。即令不是古本《竹书纪年》语，孔颖达既然引用了“周二王并立”一大段话，那么接下来的这句话也当有所本。

纪年，只能以平王紧系幽王，而没有可能记“周二王并立”之年。由于西周王朝覆灭于周幽王十一年，随即开始多年的政局动荡，因此若溯其源，说平王东迁始于前 770 年，也还是可以说通的。

平王高寿，若从幽王十一年算起，到鲁隐公三年（前 720）去世，他在王位时间长达 51 年。^① 观平王之作为，他面临被废黜之险境时毅然逃奔西申，审时度势图谋发展，可见其机智；被拥立为“天王”，揭橥叛父之帜，可见其勇敢；与势炽力强的携王对峙周旋长达十余年而不屈，还网罗秦人攻伐携王和戎族势力，^② 并且最终获胜，可见其坚韧；在极为复杂的局面下凭衰周之势而争取诸侯的支持，得以续周之王统，使周王朝政治得以延续，从而保持大局之稳定，可见其才能。平王时的王朝大局虽然远逊于西周盛世，但亦非跌落谷底之状。古代学者每以其衰微言之，如晋儒范宁谓“平王以微弱东迁。征伐不由天子之命，号令出自权臣之门……下陵上替，僭逼理极，天下荡荡，王道尽矣”，云云。^③ 平王东迁之后的周王朝总体趋于衰落固然无疑，但这是一个过程，并非甫一东迁就是如此。顾栋高对于春秋初年周王朝形势的认识比较客观。他说：

东迁以后，政教号令不行于天下。然当春秋初年，声灵犹未尽泯也。郑伯、虢公为王左右卿士，郑据虎牢之险，虢有桃林之塞，左提右挈，俨然三辅雄封。其时赋车万乘，诸侯犹得假王号令以征伐与国，故郑以王师伐邾，秦偕王师伐魏，二邾本附庸也，进爵而为子，滕、薛、杞本列侯也，降爵而为子伯。列国之卿犹请命于天子，诸侯之妾犹不敢僭同于夫人。虎牢兼并于郑，仍夺之还王朝；曲沃以支子篡宗，赫然兴师而致讨。^④

他所说的春秋初年周王朝余威尚存的情况多为桓王时事，此时之余威与在位长达五十多年的平王奠定的基础当不无关系。平王在位时，天下初定，战祸消弭，诸侯霸主尚未崛起。清华简《系年》说东迁之后，“莫（郑）武公亦政东方之者（诸）侯”，^⑤ 所谓“政东方之诸侯”即行政令于东方诸侯，这个政令不是郑国之令，而是平王之令。或谓平王参与弑父，“借手腥羶，无殊推刃”、^⑥ 或痛斥“无父之宜臼”，^⑦ 或以平王“弃岐丰七百里之地”，^⑧ 以此责备平王，实为忽

① 按照笔者的看法，宜臼在幽王八年时即已称王，若此，则他在王位的时间还要再长一些。但此点尚无更确切的证据，所以暂不列入平王在位年数之内。

② 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平王册封襄公语，谓“戎无道，侵夺我岐、丰之地，秦能攻逐戎，即有其地”。该事应与伐攻携王有关。（参见晁福林：《论平王东迁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91年第6期）

③ 钟文烝撰，骈宇騫、郝淑慧点校：《春秋谷梁经传补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6年，“范氏元序”，第6页。

④ 顾栋高：《春秋大事表》卷20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第1673页。

⑤ 简文“政”字，原整理者谓“与‘正’通，训为‘长’，此云郑武公为东方诸侯之长”（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貳）》，第140页）。此说固然可通，但作为诸侯之长者当即侯伯，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八年“王命尹氏及王子虎、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”，此不言“策命”事，所以简文“政”当指政令、行政、政权之政。犹《左传》所载“王崩，周人将畀虢公政”、《国语·晋语》三所载“秦始知河东之政”的“政”。《史记·郑世家》载驪山之难以后，“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，甚有功，周平王命武公为公”，只言“立为公”，不云为侯伯，似可理解为郑武公以王卿身份主东方诸侯之政。

⑥ 梁玉绳：《史记志疑》，第103页。

⑦ 崔述撰著，顾颉刚编订：《崔东壁遗书·丰镐考信录》卷7，第247页。

⑧ 顾炎武：《日知录》卷2“文侯之命”条，栾保群、吕宗力点校：《日知录集释（全校本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10页。

视当时形势的苛求。观平王之经历，他以困顿之身走出左右逢源之路，让周王朝复立于洛邑，对于稳定天下局势起到关键作用。平王虽非一代雄主，也非出类拔萃之圣王，但若谓他是一位能够审时度势挽狂澜于既倒、继文武之绪而稳定政局、施福祉于天下的英主，则庶几近之。

四、余 论

两周之际（自幽王之末到平王东迁的二十年间）政局多变，后代史家关于这段历史的认识也长期处于光怪陆离的境地。司马迁慨叹两周之际相关“史记”焚于秦火，应有一定根据。然而，“秦火”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导致此间史事失载的更深一层因素？动荡不安的世事纷扰之中，史官传统的颓败，亦可能是重要原因。

两周之际诗作众多，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贵族官员无所适从、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。《诗·小雅·雨无正》篇所谓“周宗既灭，靡所止戾。正大夫离居，莫知我勩。三事大夫，莫肯夙夜。邦君诸侯，莫肯朝夕”，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表达。平王或携王左右史官之有无，虽无材料予以说明，但若推断当时史官离散，不再为王朝执笔，则似不荒谬。若真如此，则两周之际的史载固然不能排除有焚于秦火之可能，但也可能当时根本没有相关记载。从体例上大体可以看出，古本《竹书纪年》、清华简《系年》中相关记载只是战国时人的追记，而非当时实录。两周之际王纲解纽、史官零落，导致王者之迹熄，左史、右史之官不再记载王者言行之迹。不唯于“周二王并立”的史事如此，而且自周平王到鲁隐公时的史事也多付阙如。“王者”的影子渐行渐远，而争霸的诸侯则尚未到来，春秋初期的几十年间史载之缺略，其根本原因似乎正在于此。

和古本《竹书纪年》一样，清华简《系年》为揭示两周之际史事提供了重要材料，让我们得以在司马迁《史记》之后对这段历史中的若干重要史事进行梳理和重构。可是，重构史事，既非一蹴而就之功，也不是停焉止焉之事。所有史事的重构都是在前辈史家探赜索隐的基础上进行的，而并非推倒重来，另起高楼。随着新材料的出现和新认识的提出，史事重构会长久进行下去，从而逼近历史真实。此外，史事重构的方式与途径，也是与时俱进，不断发展的。在梳理的过程中，有些陈旧的认识可能会被扬弃，随着理念的变化，有些新的认识会被提出。例如，前人所发出的对于周平王参与弑父的指责，以至于无视周平王于乱局中力挽狂澜的功勋，这样的认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其偏颇而不被认同，能够客观地进行评说了。另外，在史事的重构中我们往往会发现，与尚在若明若暗的史事相较，那些我们曾经以为已经看得清楚的史事中其实“未知”部分可能远远大于“已知”部分。所谓史事重构，大体说来就是补苴史载之阙、“恢复”被遮蔽的史事以及订正被扭曲的史事。这些既需要新材料，又需要新认识。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，可以说为王国维所云“古来新学问起，大都由于新发见。……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，固不自今日始矣”，^① 提供了一个佐证。

关于两周之际史载阙略的原因，似乎还有另外一个因素。东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社会理念中，对于周王朝的尊崇和自幽王之后王迹之渐熄，弥漫着一种眷恋和失落的情愫。正如孟子所云“王者之迹熄，而诗亡，诗亡然后春秋作”，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清华简《系年》第8简写两周史事，特意加上“周亡（无）王九年，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”一语，正表明时人对于

^① 王国维：《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》，《王国维遗书》第5册《静庵文集续编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书店，1983年，第65页。

“亡（无）王”状态的无奈。王统断裂的严峻现实与周初以来政治社会理念形成强烈反差，人们由此趋于有意无意地忽视两周之际的“二王并立”，由平王而直续幽王的叙事方式显然更加简略明快。然而史事毕竟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。古本《竹书纪年》和清华简《系年》记载了两周之际纷纷扰扰的二十年间的史事，也许正得力于滥觞于先秦时期的中国史学“求真”传统，才有这些宝贵记载流传至今。

附识：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悉心审阅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。

〔作者晁福林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。北京 100875〕

（责任编辑：晁天义 责任编辑：路育松）

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13 年第 12 期目录

- 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者、探索者和先行者 王伟光
- 《实践论》和《矛盾论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启示 许全兴
- 户籍改革、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层级体系优化 梁 琦 陈强远 王如玉
- 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
——基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 王跃生
- 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
——以“书同文”和“官话”为视角 苏 力
- 论清词的经典化 沙先一 张宏生
- 面向计算的汉语动词蕴涵关系研究和型式库建设 李新良 袁毓林
- “冠带荣身”与明代国家动员
——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 方志远
- 国民革命时期中共“平民政权”思想的演进轨迹 于化民
- 行动的逻辑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“知识转向”的意义 秦亚青